



# 我对高等职教的看法

高职高专的教学不是按照普通高校那样办,而是根据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方式来确定的,尤其是在实习、实训方面,因此高职高专办学模式区别于以前那种老大专的办学模式。

□ 福建 潘懋元

为什么当前高等职业教育要以准确定位、办出特点作为主题呢?据我所知,当前的高职高专面临两个新形势。一个形势是当前高教的发展形势大好,但是就业的形势却很严峻。全国有1374所高职高专学校,这还不包括本科院校办的高职,到2002年底,我国高等学校数量(包括普通高校和成人高校)是2003所,高职高专院校占68.6% 2/3多,高职高专学生数量也占了54%。高职高专院校不光数量多,而且一些示范性高职高专院校也崭露头角,比如说深圳的高职学院、天津的技术师范学院等,现在数出100所办得好的示范性高职高专学校是不成问题的。这些高职高专学校体现了高职的特点:办学模式、课程体系、教材、教学方法、师资等。高职高专的教学不是按照普通高校那样办,而是根据培养职业技术人才的方式来确定的,尤其是在实习、实训方面,因此高职高专办学模式区别于以前那种老大专的办学模式。这种新的办学模式正在形成。办得好的学校,都是跟企业有了广泛合作关系,产学研搞得比较好,比如说上海的二工大等。“双师型”教师队伍在办得好的高职院校中也成长很快,因此社会的认同度比较前几年有所提高,尤其是沿海地区的高职高专。但是,在的大好形势下,就业率不高形成了一道阴影。媒体炒的很厉害,55.7%的就业率动摇了办学者的信心,就业率高的学校,还是有信心的,但相当大一部分存在信心不足的问题。教育决策部门也顾虑重重,到底还扩招不扩招?当然要扩招,因为要走大众化的道路。我们现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刚刚达到16%左右,那是大众化的起步。有一种论调,认为今后的扩招只增加本科招生数,不要扩招专科层次的学生。如果只扩招理论型和研究型的本科,它们的就业率从目前来说比高职高专好一些,原因很复杂,但不能得出社会更需要理论型人才而不太需要技能型人才的结论。如果都往那边发展的话,今后我们的大众化将变成精英型的大众化,这行吗?这就使决策者犹豫难定:究竟是扩招本科还是扩招高职?同时也为理论工作者出了一道难题。理论工作者认为中国必须走大众化的道路,因为中国要科教兴国。而中国要走大众化的道路,必

须依靠两根支柱,一根是高职,一根是民办,这样才有发展前途。民办解决政府投入不足问题,而高职解决经济与社会对人才需求的问题。发展高职、民办,既符合于高教发展的规律,也是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验。如果不发展高职、民办,都靠传统的公办本科大学进行精英教育,大众化是“化”不了的。

我个人认为,高职就业率较低,除了社会上的传统偏见之外,主要原因是定位不明,缺乏特色。我认同一些同志说的55.7%就业率是媒体炒作的结果,这是去年8月份以前签订合同的数字,9月1日以前报给教育部的。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严重,毕业生找工作,毕业后还可以找。毕业即就业,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分配观念,并非市场经济时代自主择业的新观念。

现在职业大学一般规定为大专层次,因此许多办学办了大专后就一心想专升本。专升本也好,升上去还应搞职业技术教育,但升上去以后大多数就从这条线跑到那条线去了,认为我也应当办成理论型的。然后呢,参与理论型本科教学评估,也就是要按理论型本科办学,以后再过几年就争取硕士点,办了硕士点以后再争取博士点,接下来要成为国内一流、国际知名。如果全国的高职院校都要办成理论型、多科型、综合型、研究型的院校,千军万马朝一座独木桥奔,这样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是很不利的。大家都知道美国科学技术比我们发达,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分布,按2000年卡耐基金会的划分,它分六种类型4个等级,第一个等级是培养博士生的研究型大学,所占的比例仅仅是6.6%;一般大学与学院(第二、第三等级)比例为29.4%;另一个等级是培养副学士的社区学院,这几年发展很快,占了43.8%。如果这43.8%都定位于3年后或5年后进到一般大学,然后又奔研究型大学层次,这绝不可能。何况中国还需要大量相当于人家的社区学院、多科性技术学院或者短期性大学,学习年限为2年到3年的学院。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,可以有一部分提高到本科层次,但升上去也应是本科高职,不能太多,太多了不符合社会的需要。现在大家忘记了或者不重视当前应该定位的任务,因此就很难办

出高职特色来。当然也不是全国都如此,刚才说有100所作为示范性高职,这些都是定位比较明确的,特色比较显著的。据我所知,这些高职,大多就业率达到90%以上,例如深职院的学生就业率不比深圳大学低。而一些定位不明确、缺乏特色的高职,就业率在50%左右,甚至有的地区只有30%左右,如果每年有70%的学生找不到工作,这些学校就很难办下去了。以上所谈主要是独立高职的问题,对本科院校办高职,不完全一样,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,还是值得我们参考的。

中国通过发展高职以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,建立高职的模式和所提出来的要求也是正确的。为什么说战略是正确的呢?1999年扩招的时候就明确主要扩招高职层次,因此高职发展得比较快,虽然许多学校认为本科生好分配,要求多扩招本科,但是,国家的决定是着重发展高职。2001年还曾准备2002年本科零增长,高职扩招5%的方案,不过后来没有兑现。所以到现在本科也扩招,高职也扩招,控制也控制不了。2002年扩招了19.5%。扩招重点在高职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,中国大众化不能依靠传统大学的大众化,大众化主要得依靠高职,建立新高职的模式也是正确的。这个模式所确立的目标,是培养生产、建设、服务、管理第一线需要的职业型、技能型人才,也就是说能够在第一线实际操作,着重应用性知识,着重具体的技能。不按学科分专业,主要按岗位来建立模块。培养出来的人才可到某个岗位去任职,而且当时强调要到生产单位实践,要求有一半的在校时间在生产单位实训。还要建立实训基地,还要求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,如此等等。这个模式的建立虽是正确的,但实施起来有很大的困难,许多高职院校未能做到。有实际困难,如教育经费不足,双师型人才缺乏。但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思想不容易改变。中国也是很奇怪,人人都要找职业,但职业两个字在校名上就感到不光彩。因此上世纪80年代办的120多所职业大学,差不多都悄悄地把“职业”两个字抹掉了。这个传统偏见不光包括社会的认识,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思想,办学者也最好把职业两个字抹掉,至今,这种现象还在发生。传统思想是相当固执的,一天两天很难改变,但也不是不能改变。举个例子:初中毕业生是升中专好还是升高中好,文革前有一个时期,许多地方的初中学生抢着要去上职业性的中专而不愿上高中。为什么不愿上高中,因为上高中之后要考大学,只有很少的希望。考不上大学,又一无所长,找工作都难。而上中专,政府保证3年后毕业生由国家分配为技术员,由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,吃“商品粮”。这说明如果政策对头,传统思想是可以改变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某些政策措施与战略方针不配套,不是战略方针指导政策措施,而是政策措施阻碍战略方针的实现。例如高考制度。统一考试有统一考试的好处,但一份考卷大家考,高分进名校,其次进地方大学,低分进高职、进民办,人为地降低高职和民办的社会地位,再加上高职经费少、收费高,国家要求高职要“低投入,高

回报”,国家给政策,但不投入。那么高职是不是可以低投入呢?据我所知一般要高于普通高等学校,虽然它们不需要精尖仪器,但生产设备不能少。“低投入,高收费”只能影响入学。

另外,单一的评估体制也指挥高职向理论型本科发展,成为压缩型本科,将高职办成老大专。这一情况目前已有所改变。我同意另外搞一套评估体系。据说要以就业率为主要评估指标,这合理还是不合理?我认为既合理又不合理。从教育理论来说,是不合理的,学校是培养人的,不是人事、劳动部门。但也存在合理的地方,促使高职要下力气培养适销对路、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。对高职来说,当务之急是定位和特色问题。有人认为,高职院校应培养高级蓝领;有人认为应培养灰领;有人认为应跳出学历框架,发给就业证书,实行“双证书”,培养“适销对路”人才。根据人才市场来定位,定位于人才市场准入,即人才培养质量符合要求,以市场为导向在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。但这个概念不能无限扩大,因为教育目的是人的全面发展。

如何办出特色,要做具体的分析。

我认为:1.要考虑所在地区经济和社会环境;2.要考虑当前以及相当一个时期的社会需要;3.要实事求是地评估自身的优势和特点。最近我考察了宁波一些高职。宁波地区中小型企业多,经济富裕,中小企业要进一步适应形势,推动经济发展,需要管理技术人员。原来只有宁波大学一所学校,现在有几所高职学校与企业紧密联系,工厂把车间办到学校,学校把实训基地办到工厂,培养的人才出路不成问题。前几年办的高职,主要是投入较低的财经、文秘、法律、计算机,而最近制造类专业人才缺乏,大家纷纷办此类专业,我认为要考虑自身的条件。

本科院校办高职有它的优势:1.名牌优势,无形资产优势。这有利于提高高职在社会上的地位。2.学历优势,可以不经层层审批就跟着本科院校颁发本科学历证书。3.资源优势,图书、仪器、教师、实习基地。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,有利于部分高职高移。从专科到本科,到培养专业性的硕士生,有利于构建新的教育体系。但本科院校办高职这些优势,是相对的。本科院校办高职也有不利因素:1.教育观、教育质量观、办学价值取向很难转变。重理论轻实践,重学术轻技能的思想没有转变,很容易“旧瓶装新酒”;“穿新鞋,走老路”,办成老大专。当前高职就业率较低的原因之一是受老大专的影响。2.本科办高职往往不受重视。本科院校主要力量不在于办高职,高职学生又有低人一等的思想,因此总想向本科靠拢。3.本科院校仪器设备、实习基地、师资等不一定适合高职的要求。

(本文为作者在“全国本科院校高职教育协会第四次学术年会”上的发言)

潘懋元:教授,博士生导师,厦门大学高教研究所名誉所长、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、全国高教学研究会理事长。